

世纪回眸

曹家齐 著

20世纪学术思潮丛书·顿挫中嬗变

20世纪

中国历史学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世纪回眸

曹家齐 著

20世纪学术思潮丛书·顿挫中嬗变

20世纪

中国历史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顿挫中嬗变：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曹家齐著. —北京：西苑出版社，
1999.9 (2013.1 重印)

(世纪回眸：20 世纪学术思潮丛书)

ISBN 978—7—80108—352—4

I. 顿… II. 曹… III. 史学史—中国—现代 IV. 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0720 号

顿挫中嬗变——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

著 者	曹家齐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 7 号 邮政编码 100039
	电 话 68173419 传 真 68173417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13
印 数	1—3000 册
字 数	179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08—352—4
定 价	25.80 元

(凡西苑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丛书编委会

总策划：杨宪金

主 任：杨宪金 安 宇

副主任：魏崇新 朱存明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祥记 王同坤 安 宇 朱存明

朱英才 李晓明 刘 洪 杨宪金

曹家齐 魏崇新

主 编：安 宇

副主编：魏崇新 朱存明



总 序

逝者如水，一往不返，生命个体和民族都被抛在时间的隧道中。生命可以毁灭，但生命的价值却不会消失；民族有兴有衰，但民族文化的精魂却不会消亡。

在世纪之交，我们蓦然回首，滚滚的历史洪流透射出新世纪的曙光，给我们以启示，给我们以希望。

20 世纪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值得总结的世纪。百年来，令人刻骨铭心的两次世界大战；核阴影下的东西方“冷战”；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互解及多极化出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兴盛与挫折；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调整与复苏；南北贫富差距拉大、不平等情况更加明显和南南关系纷繁复杂；举世瞩目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创造财富的方式、思维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改变；商业竞争加剧、金融震荡不居、经济发展步履艰难以及人口爆满、能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纠纷冲突频仍等等，一桩桩，一件件都进入人们的视野，影响着人们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观念，影响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制约着人们的权衡与决策。

20 世纪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结束了封建皇权并经过艰苦奋斗而走向人民共和，赶走了侵略者而实现了民族独立，由封闭锁国而走向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和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中国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新的文化精神、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生活方式。

因此，总结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的学术成就、知识体系和存在的问题，展望未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有人说，此时最适宜为 20 世纪的人文中国“结账”；也有人说，现在最应该为 20 世纪的知识大众“招魂”……然而，我们却不禁要自问：我们究竟要何为？我们究竟能何为？在这里，我们想说的和所能做的只是要对 20 世纪中国所走过的历程作一回顾，对人文中国的发展作一概括，阐释其文化精神的内涵。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丛书。我们的宗旨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立足 20 世纪，面向 21 世纪，将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熔于一炉，使历史总结与展望未来相得益彰。我们将努力使学术问题大众化，追求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统一，力求做到意新文美。

面对新的世纪，我们祈祷人文中国在磨难中获得新的生机，我们企盼着 21 世纪的美梦成真！

“世纪回眸”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九年五月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蜕变之萌动：冲破传统樊篱	(8)
一、根深叶枯：传统史学之盛衰	(8)
二、脱胎换骨：史界之革命	(16)
第二章 新的纪元：中国历史学之大转机	(36)
一、唤醒沉睡的宝藏：新史料的发现和整理	(36)
二、移花接木：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	(40)
三、扫除尘障：疑古辨伪运动	(43)
四、火炬燃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萌芽	(47)
第三章 星火燎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发展	(50)
一、论坛攻伐：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	(50)
二、五大先锋：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	(53)
三、帅帐功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	(65)
第四章 索实真味：考据与实证学风之盛	(69)
一、朴学新光华：传统考据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结合	(69)
二、“二重证据法”：王国维的治史方法及成就	(71)
三、中西贯通：陈寅恪及其史学成就	(75)



四、竭泽而渔：陈垣的治史方法与成就	(78)
五、剥去古史神光：胡适与顾颉刚的史学成就	(81)
六、史学即史料学：傅斯年及其史学研究	(85)
第五章 初航喜忧：建国初 17 年史学之得失	(88)
一、方向一统：马克思主义主导理论的确立	(88)
二、金花朵朵：几大史学问题的讨论	(93)
三、新耕之收获：新领域的开辟与研究成果	(102)
四、稚气与无奈：17 年中史学之失误	(109)
第六章 10 年沉痛：“文革”中史学的悲惨命运	(119)
一、“恶风”难挡：史学阵地之失陷	(119)
二、荒唐之极：历史观念的扭曲	(124)
三、巨星陨落：史家之罹难	(133)
第七章 光辉的历程：最后 20 余年的发展	(138)
一、挣脱锁链：史学之拨乱反正	(138)
二、浪头迭涌：史学思潮之递嬗	(145)
三、绚丽华章：卓越的成就	(155)
四、辉煌背后：“危机”与困惑	(175)
第八章 支流异景：台湾香港史学状况	(181)
一、稳中有变：台湾史学概况	(181)
二、百川会流：香港史学概况	(187)
结语 无尽の開掘	(191)
主要参考文献	(197)
后 记	(200)

导 言

回顾过去的 100 年，中国历史学完成了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嬗变，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然而这一嬗变过程，却呈现为顿挫崎岖的轨迹。正如著名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所言：“在本世纪内，中国的传统史学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式的改造，也经历了迂回曲折的发展过程。”^①

中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是中国文化史的宝藏，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中国传统史学之发达，不独为今之中国人所共知，亦令外国人惊叹。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它积淀出许多特点鲜明、传习悠久、影响深远的思想、学风与经验，如深刻的历史意识、恢廓的历史视野、鲜明的时代精神、秉笔直书的品质、经世致用的意旨、重视考据的学风和丰厚的理论积累等，这便是我们传统史学所蕴含的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如发达的根系，深深地扎在中国文化这块土壤里，凝聚成顽强的生命力，滋养着中国传统史学这棵参天大树，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骄傲。然而，由于中国社会发展至明清和近代出现了严重的滞缓，致使中国传统史学缺乏新的养料，其发达根系的生命力受到了严重约束。中国传统史学这棵大树的枝叶渐趋枯萎，日益暴露出其封闭保守、线条简单、内容狭窄等弊端，与同时代已形成专业化而且流派纷呈的西方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史学要发展，必须吸纳新的营养，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历史把这一使命交给了 20 世纪。

引起中国传统史学发生蜕变的直接动力是西学的传入和中国社会的变革。西学传入中国始于明末清初，由于清朝前期社会相对稳定，对中

^① 王曾瑜.《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国学术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的传统格局被打破，中国社会走出中世纪，步入近代历程。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西方学术文化也大量涌进中国，使中国的学术风气发生变化。面对内忧外患、时代的变革和西学的冲击，在 19 世纪先后有地主阶级经世史学派和具有维新思想的资产阶级改良史学派，冲破传统史学的樊篱，开创了学术新风气，为 20 世纪史学的大变革奠定了基础。

西学对中国史学影响最大的就是进化史观。19 世纪末，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在此以前的中国传统史学中，虽有史家提出历史发展观，但从整体习惯上却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社会历史越古越好，上古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中国之道统，越到后世，大道衰微，历史越退化。而进化史规则认为，历史是进步的，而且是有因果关系的，有“公例”可寻。这种变化发展的历史观大大开拓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与思路，因此，迅速风靡全中国，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推动中国史学从经世史学时代向社会进化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时代过渡。这一历史观的转变，从今文经学派和康有为已经开始。进入 20 世纪，一代学术大师梁启超则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新的史学理论体系，首开中国史学革命之先声。

20 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对中国旧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喊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提出并初步论证了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认为史学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鲜明地提出历史是前进的运动。以此为基础，梁启超对历史的发展方式及其动因、史学的作用、史学的研究方法以及史家修养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新见，从而建构起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体系。与此同时，章太炎也积极倡导进化史观，认为史学要“发明社会进化衰微之原理”，强调史学的社会功用，并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全面批判和总结。尽管章太炎和梁启超在许多观点上存在分歧，但都认同“人群和社会的进化”。近代进化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几乎和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它促进了思想解放，使人们摆脱迷古崇古的思想束缚，改变了传统的历史观念。不仅如此，在“史学革命”的号召下，从 20 世纪初



开始，史学著作也从体例上突破传统的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等形式，开始另辟蹊径。1902年，夏曾佑响应梁启超口号写出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至1906年分三册先后出版），是中国第一部章节体史学著作。另外，以单篇论文形式对历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方法也开始起步。由此可以看出，在20世纪初以梁启超的“史学革命”为界标，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近代史学剧烈地蜕变，并由此显现出中国史学研究的转势。

在新的观念推动下，至20年代以后，中国历史学又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步入一个新的时代。甲骨卜辞、汉晋简牍、敦煌文书、史前遗址、青铜彝器、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以及太平天国文献等新史料的发现与整理，使历史研究所据资料由原来的经、史、子、集扩展到原始档案和地下出土的文字、典籍和实物资料，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开阔了视野，拓宽了路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为中国历史学提供了新方法、新资料并扩大了研究领域；顾颉刚发起的疑古辨伪运动，为中国历史学发展扫除了尘障，划时代地把中国传统中的古史系统从旧的霾雾中解放出来；李大钊《史学要论》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萌芽，成为照亮中国历史学新里程的一把火炬。另外，西方一些史学流派理论陆续传入又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20年代以后至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历史学出现了本世纪的第一个繁荣期。

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学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一部分是实证史学派。20年代，李大钊出版《史学要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并以此为基础对历史的基本概念和史学理论、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和对建构历史学理论的努力，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0年代末，由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内托陈取消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歪曲，结果在学术界拉开了中国社会史研究之争的战幕，引发了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结合大量考古和文献史料，第一次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天地，标志着中国史学的正式形成。郭沫若继续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并不断对自己的学术观点



进行发展和补充，与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一起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五大先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由小到大，在中国渐成燎原之势。与此同时，作为非职业历史学家的毛泽东，利用马克思主义对历史问题的论述，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与发展或者说把唯物史观运用于历史学研究，是本世纪中国历史学最剧烈的变化，是中国历史学的伟大进步。因为唯物史观对历史的解释比进化史观更为科学。进化史观承认历史的进步，但还不能解释许多复杂的历史现象。唯物史观相对进化史观来说，是更高层次的理论，它承认进化史观，包含了进化史观的合理内核，并超越了进化史观，在承认历史是进步的、具有因果关系的同时，明确提出客观世界是被规律所制约着的，历史的发展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当然，这一规律不像自然界规律那样单纯，而是掺进人的活动，通过偶然来实现必然。唯物史观还认为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是经济原因，但历史发展又是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是最重要的却不是惟一的环节。另外，唯物史观把阶级斗争看作阶级社会前进的动力，但阶级又存在于一个统一体内，各阶级之间既有矛盾对立性，又有相互统一性。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既反映又促进了中国历史研究方向的转变，使历史研究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事件为主的方面，转向面对社会和经济这一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的生活物质条件，并重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作用。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引起了中国历史学家对社会制度的研究。另外，马克思主义还重新唤起了中国历史学对历史研究理论前提的兴趣。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乃至整个学术研究的巨大影响。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本世纪上半叶就奠基和创立起来，但由于受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还未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新中国成立以前，中



国史学的主流是实证史学。实证史学是直接承继梁启超近代史学观念，将中国传统考据学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相结合的一种史学流派，这一学派注重以史料为基础，以实证主义或实验主义方法对历史进行分析、论证、解释，依靠理性的推导、逻辑论证、归纳演绎得出结论，对上古史、中古史、蒙古史、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哲学史、小说史、学术思想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等做了多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为实证史学奠定了历史地位。这一学派中，可谓群星璀璨，涌现出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陈垣、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钱穆、张荫麟、吕思勉等一大批著名史学家。他们大都兼通中西之学，不但在史料的搜索、辨伪和考释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探索某些历史现象的因果方面作出了非凡的贡献。虽然他们在史学研究中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但他们个人的史学功底和造诣，是本世纪下半叶史家们所未能企及的。

实证史学之盛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发展，构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史学繁荣的景象，但由于当时时局艰危、民生疾苦，也给历史学的发展造成许多不利影响；史学家们生活的颠沛、研究条件的简陋，使学术研究受到很大的限制；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以及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敌视与排斥，也使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还比较狭小。然而这种风雨如晦的艰难岁月，也使当时的史学家们在历史研究中，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高扬爱国主义精神，树立起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鼓舞和教育着后世学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地位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旧中国长期处于被排斥地位的情况，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大陆史学研究的主导理论，大多数史学工作者逐步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指导研究工作。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继续辛勤耕耘，不断推出新的成果；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成长壮大起来，并同共和国一起经历了未来历史的考验。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中，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如：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



萌芽和汉民族形成问题，被誉为“五朵金花”，成为当时史学繁荣的重要表现。另外，还开辟了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史学史、世界史等新领域，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然而在这个阶段，由于逐步发展起来的“左”倾路线的干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下，中国历史学在对待历史和现实这一阶级基本问题研究领域上，未能适时地完成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变，因而影响了自身的发展。同时，许多史学工作者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惟一而排斥其他理论，而且也未能完全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中出现了教条主义和简单化的倾向，酿成了许多失误，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另外，现实政治对史学的左右也大大影响了历史研究范围的进一步开拓和对外学术交流，使中国历史学研究局限于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课题上，孤立于世界史学发展的主潮之外，并严重滞后于世界史学的发展。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历史学遭受了空前的浩劫。历史学尊严尽失，被践踏、被滥用，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影射史学流行，全民批林批孔，学习儒法斗争，批《水浒》、批宋江，历史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许多史家因坚持真理而遭罹祸难，使中国历史学蒙受了巨大损失。“文革”十年的中国历史学，仅用“停滞”、“倒退”之字眼，已不足以形容，它完全偏离了作为一门科学所依据的轨道，表现为癫狂、扭曲、变态之怪象，声名狼藉，中国历史学的此番境遇，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历史学才从一片废墟中走出来，获得新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中国历史学又步入了科学发展的轨道，开始了它本世纪最后一段也是最光辉的历程。在这20余年中，大量的史学人才被培养出来，中国历史学家经过反思与探讨，挣脱了“左”的锁链，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历史科学领域的拨乱反正斗争，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克服简单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思想和方法，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确方向而努力。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认识活跃、视野扩大，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中国历史学从长期封闭的状态中走出，吸纳和借鉴国外各种史学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呈现出勃勃生机，



走向世界。

最后 20 年，中国历史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热点问题的再讨论、史学理论的建设、文化热的兴起、社会史研究的复归、考古学的兴盛、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世界史研究的突飞猛进、新领域的开拓，共同绘成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绚丽华章。但是，这一时期内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辉煌背后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由于建国后 30 年形成的一些错误观念未能彻底改变，使新的史学体系、理论、方法还未得到稳定发展，没有富有个性特点的体系出现，老化的课题和研究领域仍然在史学界中占有大块地盘，以致于较严重地脱离了社会现实，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因而在 80 年代中期，便突出表现出来，被称为“史学危机”。另外，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历史学这类高雅文化受到现实社会的冷落和轻蔑，使史学工作者们在历史学该如何适应形势的变化问题上产生了困惑，降低了对史学研究的热情。同时，一些不良世风也对学术界产生了严重影响，使学术界弥漫着一些恶劣的风气，影响了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但这些现象对于 20 余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极其次要的，也是暂时的，社会不能没有历史学，中国历史学正潜动着它无穷的力量向新的世纪跨越。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即将走完百年路程，跨进 21 世纪。中国历史学这 100 百年的历程，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经历了一个个激流险阻，依然奋勇向前。20 世纪是中国社会变化最为剧烈的世纪，也是中国历史学发生最大变化的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百年历程，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或者说是一个缩影，回顾和了解中国历史学的百年历史，会给人们在世纪之交认识中国史学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留下有益的启示。



第一章 蜕变之萌动：冲破传统樊篱

一、根深叶枯：传统史学之盛衰

1. 生命之根：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说到一个国家的历史，世界各国中以中国的历史最为长久，而且也只有中国历史的内容最为广大。纵的方面是自文明产生以来 5000 年未曾中断，横的方面是包括占地面积最广、人口最多的一个历史范围和历史系统。在这样一个国家的历史中形成的历史学大都是最发达的。

中国人很早便知道记载历史，中国的历史记载不仅丰富且至少已经有 2000 年未曾中断过，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可相比。中国的历史记载，单就正史而言，至清代已形成连续不断的二十四史，而今又有二十五史、二十六史之称。从记载体裁和修撰方式上看，便有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政书、杂史、地志、学史等多种形式。近代史学大师梁启超将其归纳为 10 种 22 类^①。中国史家之众多，史载之宏富，不仅为中国人所共知，亦令外国人惊叹。西方思想史、科学史上，有两位声名显赫的学者对中国史学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一位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Hegel），他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② 另一位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Toseph）曾就中国历史编纂法写道：“也许不用多说，中国所能提供的古代原始资料比任

^①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三联书店，1956。161 页。



何其他东方国家、也确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要丰富。譬如，印度便不同，它的年表至今还是很很不确切的。中国则是全世界伟大的有编纂历史传统的国家之一。关于某一事件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中国往往不仅可以确定它的年份，而且还可以确定月份，甚至日期。……尽管各个朝代的官职名称不断变化……但都设有史官专门记载不久前发生和当时发生的事件，最后编成完整的朝代史。这些史书所表现的客观性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最近曾有德效骞与修中诚加以赞扬和描述。”^①中国历史学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宝。

中国史学之发达，在古代便已表现得非常充分。中国古代的史学，在形式的多样性、内容的广泛性和时代性方面，都有比较充分的发展，从而具有鲜明的特点，不独在当时，而且对后世都有很大影响。我们所说的传统史学，便是指古代史学而言，即中国近代以前的史学，亦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史学。传统史学是我国史学的宝贵遗产，这份遗产在古代曾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并表现出无比的辉煌，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积淀成许多特点鲜明、传习悠久且影响深远的思想、学风与经验，这便是我们的史学传统。

中国古代史学具有许多优良传统，这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宝藏，而且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中国古代史学之优良传统，择其要者有以下几方面^②：

一为深刻的历史意识，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核心。中华民族是具有深刻历史意识的民族。从《尚书·召诰》说的“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到龚自珍倡言“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③，这种历史意识从古代一直贯穿到近代，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史学历数千年而绵延不绝，史家、史著代有新出，史观、史法不断进步，正是这种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之民族特点的反映。

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通过史学的发展，反映在历史观点上的成就，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导论》中文版. 科学出版社, 1990. 74 页。

② 此处参阅瞿林东《中国史学散论》.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8—29 页。

③ 《龚自珍全集·尊史》。